

BIANYUAN
DE
JINGXIANG

“边缘” 的 镜像

刘宗灵◎著

「五四」前后四川的
政治、文化与思想专题析论

即使是国家地理空间框架下的「边缘」之地，也会斑斑点点地映射出那个时代的总体镜像。地方以自己的独特形式折射出国家的整体境况，国家则以千丝万缕的联系牵引着地方的走势。



燕山大学出版社
YANS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的镜像：“五四”前后四川的政治、文化与思想专题析论 / 刘宗灵著. — 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2.3

ISBN 978-7-5761-0311-3

I. ①边… II. ①刘… III. ①四川—地方史—文集—1912—1925 IV. ①K297.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2)第 013434 号

“边缘”的镜像——“五四”前后四川的政治、文化、思想析论
刘宗灵 著

出版人：陈 玉

责任编辑：柯亚莉

封面设计：方志强

责任印制：吴 波

出版发行： 燕山大学出版社
YANSHAN UNIVERSITY PRESS

地 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河北大街西段 438 号

邮政编码：066004

电 话：0335-8387555

印 刷：英格拉姆印刷(固安)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6.5 字 数：130 千字

版 次：202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2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761-0311-3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335-8387718

本书出版受到电子科技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教师成长
接力行动计划、电子科技大学 2021 年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
文科重点项目培育计划资助,特致谢忱!

前 言

省区地方是中国的根本组成单元,国家的总体演变趋势往往会在每个特殊的“地域”中呈现出来。文化上的相交相渗,政治上的央地博弈,经济上的内外融通,社会上的多方流动,是近代中国国家的重要特征。在中国地广人众、内部差异甚大的特殊国情制约下,将中央舞台上发生的事件与时局变迁,置于“地域史”这样地理空间与历史时间交织的维度之中考察,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环境等诸多元素构成的综合体系中展开特定议题的历史审视与多层次探究,是将宏大“国史”在具体“地方史”中的折射映象勾勒出来的重要途径,有利于今人认识

普世之月如何映照进山河万川之中。^①

巴蜀之地在全国战略格局中的重要性，是毋庸讳言的。四川深居中国内陆腹地，在地理格局上自成一个单元，人口众多，物产丰裕，农耕经济较为发达，近代以来虽因与外界交通困难而民风民俗变迁稍显滞后，但人文环境并不十分闭塞，东部沿海或国家中心区域的各种信息、物资，均能沿着长江水道及其他管道传递入川。1891年重庆开埠以后的四川区域，在近代化浪潮加速冲击之下，也呈现出在新旧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纠葛摆荡之状，外来势力的逐步进入与人员资源的内外对流扩大，亦不可逆转地改变了蜀中的社会结构。^②

导致国家政权鼎革的辛亥革命以及影响文化范式裂变的新文化运动等清末民初的“大变局”，所造就的社会震荡与结构错位，给处此阶段的四川社会也带来了或剧烈或温和或明显或潜

① 笔者在此并非单纯强调四川区域的特殊性与不可通约性，自然每块区域的历史都有其特定的内容、层次与面相，但这并不构成绝对独立于其他区域乃至整个民族国家的相对主义特征。无论映照在具体山川沟谷里的“月光”如何具有此时此地的独特意境，但其总是由那一轮深具本质规定性的普世之月播洒出来的光影，微观特殊性与宏观普遍性在此意义上并不截然对立。因此，笔者甚为赞同学界的下述阐释：“尽管在历史学的性质、作用和功能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广泛分歧，但作为一门科学，历史研究绝不应仅仅将描述一些特殊的历史现象、讲述一些特殊的历史故事作为根本使命，它的最终目的一定是实现宏观或普遍历史的科学书写，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历史规律、诠释历史本质、论说历史嬗变之因。”参见吴志军：《应当注重思考和探究地域史研究的历史哲学基础》，《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0期，第49页。

② 参见隗瀛涛：《四川近代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27—137页。

在的绵延不绝的影响。尤其是接受外界讯息较为敏锐的川内读书人，在清末民初政治失范、社会失序、经济滞后的境况下，对乡土地域的内乱纷扰、武人专横状况愤懑于心，而传统伦理规范与价值体系的逐步崩塌，也猛烈地冲刷着他们原本平静的心灵，旧有道德秩序面临着瓦解的危机。这正如既往研究者所论：“长江上游地区社会的近代化打破了人们封闭的安居乐业的传统心态。……在近代化进程中，传统的文化遗产被削弱，而逐渐让位于基本不确定的规范和价值。后一代的成长环境和培育规范直接受到各种潮流的影响：小农经济破产，科举仕途断绝，城市化冲击家庭结构，地方社区日趋解体，农民由乡村大量流向城市，士农工商传统等级错位，重义轻艺价值观四处碰壁……，人们的心理平衡被破坏了。”敏感的读书人们纷纷转向由夔门之外传来的各种新理论、新思想与新主义中寻求自身乃至整个社会的新出路，以寻求对自身与社会苦痛的超克之道。“社会的近代化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分裂，近代的环境倾向于把社会原子化，它使社会成员失去共存感和归属感，而产生出危机感和奋斗感。人们要跟上时代的节奏，总感到不安全和焦虑、甚至难以言状的痛苦。”^①动荡剧变时代所产生的种种焦虑不安，只有在对社会革新之途的多方求索中才能有所缓解。

民国初年陷入军阀混战泥潭的川中社会，在黑暗困窘中苦

^①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2001年，第736—737页。按，本书引文中，尤其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引文，有若干错误，为尊重原文，一仍其旧，不作改动。

苦挣扎的同时,也逐渐孕育着新的不绝如缕的生机,沉沦与转机往往伴生于同一个胚胎之中。尤其是到了“五四”前后,新的传播媒介、新的思想因子、新的组织方式、新的流动渠道等等,均在川内读书人中激发着新的希望,昭示着新的未来。不过,面积辽阔的巴蜀地区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地域差别,在对外部新讯息、新文化与新模式的引入过程中,步调并不一致。例如,作为川省首善之区的省会成都,自然在潮流中有着“春江水暖”的地位,《星期日》《半月》《新空气》《威克烈》《直觉》《四川学生潮》《人声》等各类承载着新鲜因子的新式报刊,便在成都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①而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青年砥砺会、青年进德会、各县旅省学会及各类新式报刊社纷纷在蓉成立,营造了一种较为热烈的新文化氛围,虽并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川中思想文化状况,但亦为后续的许多革新埋下了潜移默化的种子。因此,本书选取的个案阐释所在的地域,便以成都为中心,兼及其他区域,但限于篇幅,无法面面俱到,也只能是撷取沧海之一粟略作剖析而已。

与此同时,正如书中所论,不同身份、地位、职业、出身、受教育层次及性格偏好的知识分子,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与新的言行组织方式过程中的人生趋向及价值选择并不完全相同,甚至

^① 如1920年初《新青年》上便介绍了编辑部位于成都商业场内的由本地趋新知识青年创办的《新空气》周刊,虽然相对于同期介绍的京沪等地数量颇多的新文化刊物来说,川内的景象显得相当单薄,但也是一种“执拗”的存在。参见《新刊一览》,《新青年》7卷3号,1920年2月,第150页。

还有诸多的差别与歧异。例如，以吴虞、李劫人、孙少荆等为代表的年龄较长、资历较深、物质方面较为匮乏的在地知识分子，便与袁诗尧、邹进贤、曾莱等各方面情况与上述均不同的知识青年在道路抉择、人生践履上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对处于不同层级、不同区位并且背景差异较大的知识分子，应当分别进行探析，而不能视之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因此，本书既选取了吴虞与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群体这样的中上层职业知识分子，也选取了1920年代初期的袁诗尧、邹进贤、巴金等激进知识青年，通过对他们在“五四”前后人生境况与言行活动的考察论述，呈现出处于全国文化“边缘”地带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各有色彩的人生路径。

本书为何名之为“‘边缘’的镜像”呢？一方面自然是因为僻居于国家西南腹地靠近边陲的地理位置，使得当时国中舆论普遍对于巴蜀之地有一种视之为“国中异乡”的心理倾向——当然，更多的是一种在特定文化想象基础上形成的刻板印象。^①这种印象，既影响着外界对四川的认知，也影响着川人尤其是川籍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另一方面，即使是国家地理空间框架下的“边缘”之地，也会斑斑点点地映射出那个时代的总体镜像，“国史”与“地方史”于此形成曲折缠绕的内里交融，地方以自己的独特形式折射出国家的整体境况，国家以万缕千丝的联系牵

^① 参见王东杰：《国中的“异乡”——近代四川的文化、社会与地方认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引着地方的走势。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而是宏观微观、上层下层、外部内里等各种要素的有机化合关系。这正如印在山海湖岳万川间的每一缕月光，都是空中那轮冷月的倒影，但这些光影又并非原初之月色的简单复制，而是融化渗透进了自身所涵蕴的诸种特征。本书只是从地方政治与思想文化的角度作一个十分粗浅的尝试，由于学力不逮及种种原因，难免漏洞百出，贻笑大方，因此，拙著中的种种谬误，还望学者同人多多批评指正！

目 录

绪论 海内外学界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述评	(1)
第一节 海内外学界关于近现代四川地方区域史的研究 成果综述	(1)
第二节 海内外学界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在川影响 研究综述	(12)
第一章 “五四”前后四川政治格局的演变与社会一般情形	(20)
第一节 民初国家政治秩序的乱局与军阀统治的形成	(20)
第二节 民初四川地区的政治乱象与军阀派系	(31)
第三节 四川军阀统治时期防区制的形成及其恶果	(42)
第四节 民国初年军阀统治之下的四川社会情形	(54)
第二章 大时代与“小地方”:成都地方精英与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传播及回响	(71)
第一节 新潮西来:“五四”前后的四川地区	(71)
第二节 时代与个人:新文化潮流下的吴虞和地方 社会	(86)
第三节 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的成立、活动及吴虞的 参与	(97)

第三章	时代思潮的地方面相：“五四”前后四川趋新青年的 个人生命史考察	(119)
第一节	民国地方知识青年的人生样态与生存空间 ..	(119)
第二节	激进青年的时代回应：袁诗尧、巴金等与《半月报》 群体	(125)
第三节	“五四青年”的困惑与转型：四川地区趋新知识 分子的个案研究	(143)
结语	“边缘”的镜像：从“地方”观察国家的近代历史演变 ..	(165)
参考文献	(172)
后记	(194)

绪论 海内外学界的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述评

第一节 海内外学界关于近现代四川地方区域史的研究成果综述

目前海内外学界关于近现代四川地方史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涉及四川地方社会^①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给世人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近代四川历史画卷,为包括本书在内的后续研究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鉴于当下各方面的研究成果已较为充实丰富,本书将只选取若干与本项研究紧密相关的代表性著作展开阐释,以尽可能集中呈现本项研究之所以展开的学术背景。

^① 本书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进行相关阐释,因此文中所涉及的“四川”概念均包含今天的重庆市在内,后文不再赘述,请读者识之。

首先,是关于近现代四川地域社会的整体性研究与通史性撰述。由学者贾大泉、陈世松等主编的《四川通史》(全七册),是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四川整体历史的通史性研究论著,该部成果最初于1993年出版发行,经相关学者重修完善以后,又于2010年出版了修订本。该套论著中的第6、7两册便是关于四川近现代历史演进的总体性论述,以较为宏观的视角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出发对关涉近代以来四川历史演进的重大事件展开了梳理与阐释,为研究者的专题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基本历史框架。隗瀛涛等学者对鸦片战争前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四川地方的社会演变也进行了整体性的呈现与分析。^①此外,由周勇主编的《重庆通史》(全两册)的第二、三卷,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在近代以来的重要变迁进行了全面的梳理,集中于现代产业经济的发展、区域政治军事的变迁、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城市的建设发展历程、行政区划与人口变迁、新式教育的落地生根、民风民俗的改易流变等等。^②学界的相关考察探讨,为本书的专题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整体性时代背景。

其次,是关于近现代四川地方政治军事演变情形的学术专题研究。美籍学者罗伯特·柯白主要探讨的是1927至1937年四川省内的黠武主义和分裂主义,也是对在政治上谋求中央集

① 参见隗瀛涛:《四川近代史》,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② 参见周勇主编:《重庆通史》(全两册),重庆出版社,2014年。

权的人在长久的分裂之后力图把该省重新统一到全国政治中去的种种努力的研究。该著着重围绕防区制的确立与覆灭来探讨四川地方分裂主义形成的观念和制度基础,其对四川历代军阀的政治权力、政治派系、政治利益的构成及其演变问题进行了深度阐释,尤其是将这种演变放在近代以来省区与中央的关系调节与上下博弈的微妙背景中展开梳理,由此对四川军阀的形成缘由、统治形式及其内在嬗变与最终归宿提出了深刻而睿智的见解。^①王春英在《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以1928—1949年川康地区县政整改为例》一书中,以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以地方制度及其相应的历史情境变迁、县政府及其以下各级基层行政机构与地方势力的关系演变(即权力易位)等作为研究架构,并通过对民国川康境内不同地域的县政运作个案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以民国地方政治制度的改革过程为大背景,把县级政府及其以下各级行政组织的演变作为研究主线,按时间顺序分成专题,着重考察四川及西康两省县级政府、县以下区、乡(镇)、村社等基层行政机构的调整及其职能的充实、县政人员的甄选与训练、基层公务人员的配置及其待遇,以及各县乡镇保甲体系调整等地方行政,探讨地方精英势力在民国后期的发展态势及其与地方行政权力的消长关系,进而透视民国时期地方权力结构的变迁历程。作者力图使“微观”与

^① [美]罗伯特·柯白著,殷钟嵘、李惟键译:《四川军阀与国民政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中观”“宏观”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努力建构一个适于解释近代中国社会基层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空间。^① 黄天华则以一系列持续性的深入研究对民国四川政治舞台上各派势力的纠葛博弈进行了细致精微的描述，例如蒋介石国民党中央与川康地方军政势力的互动、川内各派军阀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青年党与国民党及川康军人之间的分合互渗，以及川康地区的社会治理、边疆政治与国家建构等问题。^② 另外，亦有学者着眼于民国前期川军各派系分割统治之下，军阀长年混战不休、残民以逞的兵患对巴蜀地方社会的深层次伤害，梳理了作为地域性军事力量崛起的川军、影响川军发展的主要因素、川军的结构与素质、川军对地方的财政榨取与恶性渗透等问题，呈现了民国时期政治乱局限束下四川地方社会秩序的紊乱与发展之坎坷。^③

再次，便是对近代以来四川地区社会文化、社会组织嬗变及舆论媒体的研究。城市史学者王笛的一系列学术作品对以成都

① 王春英：《民国时期的县级行政权力与地方社会控制：以1928—1949年川康地区县政整改为例》，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② 黄天华：《抗战后期地方军人筹组“西南联防政府”及各方因应》[《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青年党与国民党的明合暗斗(1946—1949)》[《社会科学研究》2020年第2期]、《抗战时期青年党与川康军人的分合》[《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四川潮涌与蒋介石的因应(1937—1940)》[《历史研究》2017年第2期]、《国家统一与地方政争：以四川“二刘大战”为考察中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1917—1918年康藏纠纷的考察》[《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等等。

③ 张远波：《乱世兵患：1911—1935年川军与当地社会》，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为中心的四川区域社会在近代化浪潮冲击之下公共空间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了细致入微的阐释、分析。在《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中,他从微观历史视野出发,以细腻的笔触对近代成都社会丰富多彩的街头日常生活、引人入胜的街头文化进行了描述,以小见大地折射出与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剧变相关的宏大叙事。^① 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一书中,他以成都常见的街头茶馆为切入点,试图通过阐明作为近代中国城市社会一个公共空间而存在的茶馆的日常运作逻辑及其中蕴含的众生百态,以尝试再现 20 世纪前 50 年成都民众的公共生活,通过考察寻求社会控制的地方政府与遍布街头的茶馆所产生的微妙联系,最终呈现近代化进程中国家权力逐步渗透进地方社会的途径与结果。作者通过这样的研究,不仅将在成都这样一个地域社会中产生的独特商业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呈现在世人面前,更是将充满斗争与博弈的市民公共领域的丰富色彩描绘了出来,给今人触摸、理解那个时代川西平原的城市社区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切入口。^②

此外,美籍学者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通过多部论著探讨了近代以来成都的城市变迁。在《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

^① 王笛著,李德英等译:《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② 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

明进程中的成都(1895—1937)》一书中她着重讨论了近代成都所经历的两个重要的城市改革运动：清末新政(始于1901年)和1920年代的市政运动。她认为在这两个运动中，警察与军阀分别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改革的动机虽不同，但都对成都的城市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成都的现代城市雏形打造了基础。该著主要试图回答如下问题：成都这座城市是如何形成今天这样的规模的？成都在中国城市之中的特殊性又在何处？近现代史上又有哪些人曾对成都的城市化进程产生过影响？司昆仑的尝试虽说并未解决所有相关的问题，但对今人了解成都的市政建设进程与城市社会的形成及其演变亦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① 在另一部著作《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中，司昆仑以散文的笔法描绘了1920年代成都各个社会阶层——学生、军人、新女性、知识青年、小商人、上层权贵以及优伶、婢女、轿夫、乞丐、妓女等下层民众，在成都这个充斥着革命、改良、动荡以及现代与传统交织互动的省城空间所面临的生存情景与所经历的生活变动，虽较为浅显却又别有意味地呈现了一个时代的多个面相。^②

提及民间基层社会组织，对于川中秘密社会的代表性结社团体——袍哥的研究，便是学界长期以来考察与探讨的一个重

^① [美]司昆仑著，王莹译：《新政之后：警察、军阀与文明进程中的成都(1895—1937)》，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

^② [美]司昆仑著，何芳译：《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